

潘红印象

金海涛

大约三十年前，市委组织部、市工会举办了一次演讲活动，我是评委之一。那是个雪后寒冷的日子。在暖气不高的会议室里，这样的活动想搞得热热烈烈并不容易。活动正式开始，从旁边的侧门走出一个拿着麦克风，脖子上随意搭着一条绛红围巾的姑娘，像个影视明星，室内的灯光一下明亮了许多，会场上的温度也升高了。我这才知道她是今天活动的主持人。再后来，知道她是安庆电视台的主播——潘红。

电视主播是电视台的名片，一名优秀的主播更是一个地方的名片。潘红相貌优雅，毛绒绒的眼睛透着现代知性女人的柔美，主持节目时气定神闲，咬字清晰，脸上总是洋溢着安静和甜美。无疑，她也是电视上一道靓丽的风景。常常听到市民们的议论：某某事情要改革了！谁说的？潘红说的。某某路坏了，政府立项重修了。谁说的？潘红啊！她似乎是政府代言人。是的，主播确实某些方面担任着这样的角色，而这个人就是潘红呀！

许多年过去了，岁月的车轮似乎没有滚动。不，只能说岁月在潘红身上没留下什么痕迹，她还是那样朝气蓬勃，充满青春活力。只是有一天，人们突然发现她鼻梁上架了一副透明的眼镜。咦，她也戴眼镜了！嗨，她怎么也戴眼镜了？人们有些惊讶，但还是觉得她是那个年轻漂亮的潘红，眼镜一点也不影响她的形象，却更恰当地展现出她的另一种风雅，另一种美丽气质。

我和潘红有几次近距离的接触，有她对我的采访，还有一次是应安庆电视台文艺部刘猛的邀请，参加“安庆达人”活动。我本不善表达，一对镜头就语无伦次，但每次都是潘红用她的机智和幽默化解我的尴尬和难堪，这让我对她非常感激。此后，我在很长时间没有见过她，也没有见到她出现在银屏上，我以为她是退到后台。只是偶尔看到屏幕上缺了她，觉得有些可惜。又过了些时候，听说她得了病，而且不轻，这让我与新闻界的朋友都为她捏了一把汗。后来，我在她的博客中看到一组“病中杂记”，其中记述了她染疾之后的历程。她那时每隔一段时间就必须独自或带着孩子开车驶往近千里之外的沪上治疗。她文笔细腻，遣词造句优美，不仅记述了医生对她的细心治疗，更感恩朋友们对她的关心，以及她对朋友亲人们的念念不舍和无限挂念。字里行间，对艰辛没有丝毫的怨天尤人，对多舛的命运没有一点抱怨。

她身体好了些，我请几个朋友约她到酒店小聚，想以此安慰她。她的出现让大家眼睛一亮，甚至微微一惊——她还是原来的样子，落落大方，依然美丽，看不出病态。但仔细看，她涂了点口红，微微施了点粉。我想，不仅是我，包括见到她的朋友都会暗暗地为她高兴，因为她的精神没有垮，她的心没有死，她对美的追求没有停顿，她肯定能好好地活下去。

但病魔还是太狠了，没有放过她。她走了，留给我们一个安静、娴熟、知性的女性形象，那么清晰。这大概是一位电视主播与一般人的区别吧！

愿潘红一路走好！

作者为安庆市作协原主席，著名剧作家，电影《月亮湾的笑声》、电视剧《孔雀东南飞》的剧作者。



安庆市新闻传媒中心职工潘红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12月17日逝世，享年55岁。

潘红同志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曾任安庆电视台播音员、《天天直播》主任编辑、制片人、安庆电视台首席播音员，是一位深受安庆观众喜爱的主持人。今天，我们特开辟专版，追念潘红。

——编者

我的老师潘红

汪小夏

在安庆，大多数市民是因为电视台的民生新闻《天天直播》以及《潘红热线》知道潘红这个名字的。在电视不可或缺的年代，安庆人每晚六点半都会守着电视机，家家传出潘红的声音。

我是2004年进入安庆电视台的，一晃已是18年。

我习惯喊她“潘老师”。在《天天直播》栏目的日子，她给我的最大感受，就是对自己特别的较劲，不单是工作，还有她一贯强调的“做人”。她是栏目主持人，也是制片人，一条民生热线以她的名字命名，因为每天能协调政府部门帮助老百姓解决一些难事，所以大家非常钟爱它。为了追求完美，她有时会表现出“狮子座”的霸道与苛刻，记者没少被她“骂”，而记者大多是年轻的小伙子，编辑部成天充满了“逗比青年”的欢乐，她“骂着骂着”，又会笑。

最让她担心的，还是记者们外出采访时的安全：时值高温，记者晕倒在稻田里；曝光阴暗面，记者被当事人扯破衣服抢走摄像机；暗访时，记者失足掉进十几米深的施工井；为农民工讨薪，记者被板砖拍破头……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她都急得要命，而她见到受伤记者第一面时，总会无法抑制住泪水，更像是姐姐没有照顾好弟弟一样自责、难过……

她的工作实在是繁重，每天的选题、改稿、审片、出镜，几个岗位连轴转，常常主持妆化了一半，又要跑回办公室，在电脑前改稿子。中午摆放在办公桌上的盒饭，在大家多次提醒之后，仍然被她“冷落”到晚上下班时间。

2012年，潘老师查出癌症，大家无不为她牵挂。幸运的是，一年后，我们发现她竟神奇般地“康复如初”。

2018年底，我们举办“春满桃园”春节联欢晚会，身为市政协委员的她，一边忙着开“两会”，一边要参与晚会的导演工作。距离春晚的正式举行还有不到一天时间，已是声音嘶哑的她，坐在石化俱乐部的第8排最中间的座位上，手持话筒，不断指导正在走台的演员们。同事将装好热水的杯子递给她，她便就着一口水，服下了不知什么时候拿在手心的药，药名“塞来昔布”。我走到一个角落，偷偷地查了一下，是止疼药。第二天的演出非常精彩，活动结束后，扛着病痛的她，躺在放平了的副驾驶座椅上，松了一口气，“回去休息几天，吃点药就好了。”从那天起，她躺在床上休养，至少有一个月。之后，她又是满血复活，真的神了！

2020年9月，市新闻传媒中心成立，她选择了提前离岗，安心养病。在办公室收拾东西的那一天，她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你好好干，新的事业，要你们年轻人去闯了，我已经到站了。”

12月17日深夜，她走了，就像睡着了一样。

“我妈妈一直说，她这一生最幸福的，就是从事了她最喜爱的职业。”潘老师的儿子潘可对我说。

作者为安庆市新闻传媒中心新闻综合频道总监

妈妈最后的日子

潘可

十年前，妈妈开始与病魔搏斗时，我在读初二；我大学毕业一年后，妈妈走了。这十年中，我感觉生命里除了自己和妈妈，再无他物。妈妈是那么要强，她生命里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用轮椅，是在她离开的前两天，让我带她从医院回家。我当时还在想，她这么强大，一定会像以往每一次那样挺过来，可妈妈用尽了最后的气力，也没能撑下去。

自三年前病情恶化以来，妈妈本就满目疮痍的身体和心理明显越来越差。在家人、同学、朋友的鼎力支持下，她下决心买了新房，那是她心心念念的江景房。之后的一年里，她在老房子的床上运筹帷幄，调兵遣将，完成了装修。那是她喜欢的新中式风格。她还搬来了那套外婆留下的实木桌椅。可到了2020年12月，临搬家前，她却说自己是将死之人，不要再给新家添“死气”了。最后几个月住院的时候，她一直认为，出院后应该回老房子去。我想，她若不是实在没了走路的力气，是不可能让我将她带回那张躺着也能看见大片江景的床上的。

搬来新家的这两年间，我想她是快乐的。她乐此不疲地购物，不能出门就网购，一件件的，大到新冰箱、六斗橱，小到洗手台上可爱的肥皂架。她是那么热爱生活，热爱生命；她的脸那么苍白，爱却是那么鲜活。

只是，在新家的两年中，她不是在求医就是在卧床，有气力起床的时候，不是在照顾阳台上的花草果蔬，就是在看她以前的日记，看完一本，就烧掉一本，甚至专门为此买了一台碎纸机。每每看到这一幕，我就想起黛玉焚稿的情节。一个人，悄悄地把自己存在过的痕迹擦干净，那种萦绕她周身的寂寥和伤感，旁人永远无法体会。

和妈妈在一起的事，我记得最早的，就是从老电视台到高琦小学那段先下坡再上坡的路。那时候，我的话奇多，尤其是跟妈妈，一本沈石溪的《狼王梦》，能被我翻来覆去地讲，一匹丧夫的母狼，是怎么千辛万苦培养她的四个小狼崽踏上狼王的道路，又是怎么统统失败……妈妈很喜欢我给她讲故事的样子，只可惜，后来我不知怎么就丧失了这样的能力，跟她在一起，一个下午也说不上几句话。

妈妈喜爱看书，涉猎甚广，她用那小小的手机屏幕津津有味地读完了《三体》，读完了《南渡北归》，然后推荐给我。我于妈妈，是最亲近的人，也仿佛是最疏离的人。亲近，是我在她身边的时间最长；疏离，是我和她的交流太少。大三因疫情在家，大四申请离校，陪着她在上海求医问药，在租住的小屋里写完了毕业论文。那是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妈妈在他乡祈求别人救自己的命，是什么样的感受。大学毕业之后，我回到安庆，继续陪她在上海与家之间奔波，照顾她每天的饮食起居。而我和她一个礼拜说的话，可能还不如她和来探望的朋友、同学一下午说的多。我与她之间总有一层看不见的壁障，原因太多太杂，我只后悔不曾鼓起勇气去打破它。

我与妈妈的故事就这么突然停驻在那个深冬的晚上。我不甘心，我有那么多遗憾，可来不及回首，由不得缠绵。从此，即使独步走向天涯，我也要像妈妈一样，一路寻觅阳光。

作者为潘红的儿子